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龙登高 著

跨越市场的障碍：

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跨越市场的障碍： 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本项目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龙登高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研究了海外华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越国家与制度的障碍的成长历程。东南亚华商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优势；美国华商则在主流与族群之间、边缘与前沿之中成长；海外华商还在中国与世界之间长袖善舞。其跨国网络与信用，有效地填补了制度性国际规则的缺失。实地调研成果还揭示了中国的侨资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所经历的制度磨合与文化适应。最后以选择论的路径从华商活动的各层面系统全面地解析了文化决定论的种种误区。作者在我国侨乡、东南亚国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西欧国家各地访学、调研逾十年撰成此书。

本书适合于经济学、管理学及社会学本科以上读者，侨务、外贸工作者，以及相关的企业界人士选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越市场的障碍：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龙登高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ISBN 978-7-03-018601-0

I. 跨… II. 龙… III. 华人-企业经济-经济管理-研究-世界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1855 号

责任编辑：陈 亮 徐 蕊 王京苏/责任校对：张小霞

责任印制：张克忠/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B5 (720×1000)

200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印数：1—2 500 字数：256 000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序

读龙登高教授的著作，你总会感到受益匪浅。作为在美国做学术研究并生活了 20 年的中国人，我对龙教授的著作产生兴趣是自然而然的。2003 年龙教授在耶鲁大学做学术访问时，笔者有幸认识他。从中国本土的传统商人与市场，到海外的华商，他潜心关注已历十余年，其著作包括《美国华人经济：在边缘与前沿的成长》（台北海外华人学会，2005）、《海外华商经营管理探微》（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江南市场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等。

以往读到华人华侨在海外的经历，你总会心里沉重，叹息中国人的苦难。但从龙教授的这部新著中，你会有一种很正面的感觉，海外华人华侨现在也进入世界主流社会了，他们也不乏在社会、政治、经济、学术上的成功故事。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正如龙教授在前言中所引述的，“华人为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2004 年资本额占了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以外的亚洲 10 个股票交易市场股票价值总额的 66%，其中，国际华商 500 强的总市值高达 5 910 亿美元”。除了东南亚之外，美国的华人也不逊色，最顶峰的成功故事有雅虎创始人之一杨致远、国际联合电脑公司创始人王嘉廉、当年的王安电脑公司创始人王安等，在更一般的层面，至 2002 年，美国华人共有逾 5 万家“专业与科技服务”企业，4.4 万家“膳宿与食品服务”企业，2.7 万家“房产与出租”企业，也有近 1 万家“金融与保险”企业；华裔家庭收入的平均数为 5.8 万美元，高于 4.8 万美元的白人家庭平均收入（见本书第三章）。

华人华侨在海外的成功当然令世界各地的华人感到欣慰，也可告慰那些当年冒险移民的祖先：冒险投资终于获得了高额回报。在明清海禁时期，皇帝下令不允许擅自出海和向外迁移，也不允许移民回国；到了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仍然不能自由迁移，华人在国内的亲属甚至遭到歧视；到八九十年代，福建、浙江、广东沿海地区偷渡移民的不理性行为受到了社会的指责。因此，决心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不仅要冒海浪、饥寒、瘟疫的生命危险，而且还要应对社会压力，也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为什么在这些巨额成本和生命危险面前他们还选择移民呢？龙教授在第六章给的一种解释是：他们实际上是基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考虑，当不同国家制度所带来的收入机会差距足够大时，移民是实现不同制度间的套利机会的具体手段；机会差距越大，愿意冒的风险就越高。这里，龙教授讲到的“人力资本”不只是指第一代移民自己一辈子中所能实现的收入差，而且也包

括他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所面对的经济机会差值。换言之，他自己不顾生命危险偷渡到美国或西欧国家后，通过在餐馆打工、之后自己开餐馆赚来的钱供小孩上当地贵族学校，让后代融入当地社会，他这样移民所带来的子孙后代的人力资本增值总和，其数值可以非常高，因此通过移民甚至非法偷渡移民所带来的投资回报可能非常之高。上面以及本书中讲到的其他海外华人华侨的成功故事，都足以说明这些移民当初的投入到今天的回报的确很可观。所以，只要农民或者任何其他人的起点经济机会很低，他的移民倾向就很强，甚至冒死偷渡也不顾忌。

传统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社会形成的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其特点之一是奖励依附土地的人，惩罚背离土地投机取巧的人，在制度之间进行套利的移民行为自然更在该贬该罚之列。更何况近代中国一再受外族的侵辱，使“我们中国人”和“他们外国人”之间的势不两立情绪达到极高点，任何移民他国的行为自然是不可饶恕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就不太会认为移民和寻求最好的经济机会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不会有太多人去尊重他人的这种自由选择权利。从龙教授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偷渡移民者实际上是制度的牺牲品，他们是问题的表现者，而不是问题的制造者。

当然，移民的起因可以是制度差别所致，可以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劳动分工所致，也可能是两者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本书所引资料表明，近40年来国际移民有很大增长，全球国际移民在1965年为7500万人，到2005年则达1.91亿，其中1.15亿在发达国家，这足以说明全球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的确在大大增加，劳动力市场全球化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么，哪些国家在劳动力市场全球化中唱主角呢？如果把历代移民与殖民及他们的后代加在一起，那么欧洲在外的侨民与后裔人口有3.5亿，相当于欧洲本土人口的50%；相比之下，海外华人约3464万，仅相当于中国本土13亿人口的2.6%。这些资料进一步证明，欧洲的确历来远比中国开放，中国老百姓在移民方面的选择空间一直太小，这不仅限制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面，而且也阻碍了中国人的发财致富与人力资本机会。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已融入各地的社会，出人头地。这种出人头地不只是经济上的，也包括在自我认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首先是当地国家的公民，然后才是华人，他们开始习惯于从当地国家公民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作为华人的身份，而不是从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他们作为当地国家公民的身份。我知道这是传统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看到华人的后裔居然还先认他的出生国，然后才认他是华人。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华人能真正从传统中国的包袱中解放出来，让他们首先是自主的人，然后才是某个族群的人的话，那么海外华人融入并认同当地社会的时候便是他们真正心态开放、收回自我的时候。

1854年从耶鲁回国的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如果今天再回到这个世

界，那么他会从这部著作中发现，这个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和海内外的华人也更加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更加“世界化”了。

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2006年9月10日于耶鲁大学

前 言

一、跨越市场的障碍：族群、国家、制度与文化

生产要素、资源与信息自由流动，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其空间越大，经济效率与收益越大，社会获得的整体福利越大。如果我们把全球抽象成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的市场，那么，资本、劳动力、土地与各种资源将会在流动中实现最佳配置，从而为人类创造无与伦比的财富。然而，市场的障碍无处不在，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对这些障碍的逐渐突破。

这些障碍有哪些呢？技术与物质设施是先决条件。“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这是司马迁时代受交通运输条件限制给人们留下的市场信条。孟尝君千里不赍粮的长途旅行是战国时代人们的梦想^①，由于旅店餐馆等设施条件有限，传统时代的商人们经常不得不风餐露宿。现代通信与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让先辈商人瞠目结舌，航空、航海、高速公路使人与任何物资能够无远弗届，国际长途电话、因特网、电子邮件使人们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交通与运输的技术障碍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让人不屑一顾。然而其他障碍的顽固存在却大大对冲了技术的巨大进步。

首先是国家。国家是唯一能够名正言顺地使用暴力的机构。它可以通过关税壁垒强行阻止外部商品的进入，可以通过外汇管制阻挡资本的流动，可以通过海关与拒绝签证将劳动力挡在国门之外。三四百年前西方人没有得到印第安土著的许可即可自由出入，如今既得利益者发明了“入境签证”来限制向往“新大陆”的自由之子。美国政府甚至打算在美墨边境修筑现代长城以阻隔非法移民。在中国则有偷越国境罪——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境。明清政府，更把擅自出国的臣民视为弃民、莠民。作为市场的障碍，国家的力量有时似乎越来越强。

其次是制度。对中国人来说，记忆犹新的是20年前的中国，物资配给制之下条块分割的市场，使几乎每个县、每个市都有差价悬殊的商品，从而给“投机倒把分子”以可乘之机。在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信条下，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水泥厂供给本县所需建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纺织厂、烟厂供给本地所需衣

^① 旅行者自己带粮食，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人们还记忆犹新。

服与香烟，每个省都被要求粮食自给。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对一个国家内部市场的强行切割，把省、市变成了市场上的一个个“封闭的壁垒”。

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全球没有统一的规则。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有的国家地理位置近在咫尺，但经济制度却有着天壤之别。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计划经济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世界才有了统一规则的可能。因此，加入 WTO 之后，还必须被成员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以期减少制度对市场的障碍。

再次是族群与文化。语言文字不通，无从获得市场信息；风俗习惯不通，将无法了解消费结构、禁忌与喜好，无法展开市场营销。不同的族群之间，文化误解与利益冲突可能导致轩然大波，在极端状况下，还会出现所谓“文明的冲突”。

凡此市场的障碍，通常来说，谁能突破它，谁就能开辟要素组合的途径从而获取较高的边际收益——就像企业家因为组合资本、劳动力与资源从而获得利润一样，就像商人因为贩运商品突破地域限制而获得差价一样。

然而，以上市场的障碍，突破谈何容易，非但如此，他们通常又是现行道德、规则与秩序的基础，人们首先必须遵从。于是矛盾出现了——既然市场存在障碍，就必须去突破才能获得收益；既然是规则，就必须遵从，才能获得秩序。^① 无论如何，总是不断有个体与机构从突破障碍中获得自身的利益并带来整体的福利。

早期各国设立制度屏障，跨国公司不得不组建自己的海军或以国家武力为后盾，通过战争来打破这些障碍，如东印度公司的海军，据说比英国皇家海军还要强大。如今，没有哪一家跨国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但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律师团。他们要利用各国制度的缺口来突破障碍推进资源全球配置。对冲基金，也是一种在不同金融制度与机构中寻找制度缺陷与投机缺口从而突破障碍获取利益的金融工具，通常只有金融学家与诺贝尔奖得主才能找到障碍的缺口并从中获利。

海外华商也是一批跨越族群与国家、制度与文化的群体。

二、华商在海外崛起

20 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东亚、东南亚沿海与海岛环形地区，有人从经济地理学上形象地称之为“亚洲地中海”，或谓“东亚走廊”，其中非常活跃的商人群体就是港台与海外华商。视野扩展到大洋彼岸，则是“环太平洋沿岸”经济带，亚裔美国人是全球化过程中跨越太平洋的建桥者，而美国西海岸的

^①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习俗、道德、规则、秩序，都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

洛杉矶与硅谷等地的新经济中，也活跃着一批科技型华商。这一区域的亚洲四小龙中，有三个经济体是中国人或华人主导；东南亚各国经济领域尤其是活跃的私营经济领域，也是华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华人在东南亚各国人口构成中所占的微小比例大异其趣。在我国港台地区、东南亚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随后在中国东部沿海经济改革进程中，在硅谷新经济中，海外华商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据《亚洲周刊》的统计，华人为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2004 年资本额占了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以外的亚洲 10 个股票交易市场股票价值总额的 66%。其中，国际华商 500 强的总市值高达 5 910 亿美元。另一份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推出的排行榜中，包括中国在内的“2006 全球华人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总额达 19 764 亿美元，相当于 200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86.82%；上榜富豪的个人资产总计超过 24 000 亿元人民币。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海外华商经验具有其特殊意义。港台与海外华商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据中国政府的估计，截至 2004 年 7 月底，中国大陆三资企业达 49 万多家，其中港台与海外华商约占 70%；实际利用外资额 5 000 多亿美元，其中港台与海外华商占 60% 以上。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真正现代意义的企业管理从政府指令与行政管理中脱胎而生，此时，学习、模仿与借鉴是极其重要的途径，海外华商投资企业成为便捷的借鉴对象。

海外华商，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具有相似的经历和文化环境。首先，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上海至海南，尤以广东、福建为主）地区的移民及其后裔，移民特性与游散族群（diaspora）特性深刻地影响着华商经济与文化各个层面。其次，东南亚与我国港澳台地区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殖民地，东西方文化交融是该地区突出的文化景观。再次，我国港澳台与东南亚地区都在 20 世纪中期相继开始经济起飞，急剧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因素的调适与变动，带来包括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在内的各方面的深刻变化。

这些独特的经历与处境，使东南亚华人社会与我国港台社会具有不少共同的特性，华商形成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既因多元文化交汇而广纳百川，形成自身的独有优势，也因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而存在种种缺陷；既在历史沧桑巨变中经受磨炼与考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因成长道路崎岖而难免受到扭曲。

东南亚等地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市场，早已有华商活跃其中，自 19 世纪中期以后迎来了潮涌而至的中国东南沿海移民，他们进而成为长袖善舞的重要力量。然而，无论在西方殖民者主导的社会环境中，还是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土著民族自立的时代，在各种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充斥的社会中，不受政治力量保障的华商如履薄冰，历经坎坷，以中华文化的传统与智慧努力寻求并最终确立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移民与土著居民、西方殖民者在冲突与交融中共存，中华

文化与西方文化、土著文化在互动中融合与变异，海外华侨华人形成自身独有的特征，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与活力，从而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等地的华商，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长期处于异族殖民统治之下，也成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前沿。中外贸易与商业在此汇聚，东西方文化在此交融、激荡。同时，香港又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都会，是他们联系祖国的桥梁与中介，不少港商与南洋华商具有双重身份。因此，不考虑政治因素，无论经济上，还是习俗上，民间对香港与南洋都不加区分，不少学者也习惯于一并分析。中国台湾与香港和澳门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及随后半个多世纪受美国的深刻影响，又使台商与港商、南洋华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不少共同之处，尤其是经营管理模式的形成道路、演进轨迹与基本特征等方面。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大陆按照国际惯例把他们都视为“外商”投资处理，直到新近才明确分开。港澳台商与海外华商，从地理上相对中国大陆而言皆称海外，不像“海外华人”一词含有政治意味，因此本书按惯例略称为“海外华商”。

三、国际学界的华侨华人研究：基于地域学术群体的观察

1. 地域学术群体

华侨华人研究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调研和探讨华人社会的结构与族群特征，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考察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征，或从历史学的角度探索华人社会的变迁，从人文地理学与人口学的角度考察华侨华人的国际迁移与分布。国际性学术组织如世界华人研究学会、世界华人管理学会、国际儒商学会都比较活跃，国际学术会议频频举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增多。国际华侨华人学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积累，该领域已形成较雄厚的学术基础，从专题研究走向整体考察，从个体分散性研究走向群体整合。在世纪之交的短短几年间，几部大型工具书于世界各地相继问世^①，具有标志性意义。

^① 1998年，潘翎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英文版、中文版），三联书店（香港）；2000年，台湾华侨协会主编《华侨大辞典》；2002年，可见弘明、斯波义信、游仲勋主编《华侨·华人事典》（日文版），弘文堂。自1998年至2002年，周南京主编12卷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中国华侨出版社）相继出版，这是一套堪称集大成的著作，各卷都有丰富的内容涉及海外华商。梁英明主编《经济卷》不仅全面介绍各国华商企业，而且涉及华商经营与管理的总结，《侨乡卷》详列在侨乡投资的重要华商企业，《人物卷》、谢成佳主编《社团政党卷》则分别详述了各地华人企业家及与之相关的社团组织。杨保筠主编《人物卷》，2001；《社团政党卷》，1999；方雄普、冯子平主编《侨乡卷》，2001。

华侨华人研究的地域学术群体，按研究者人数与特质而言，大体有如下五个群体：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西方（北美洲、欧洲、澳大利亚）。而东南亚与西方又具有一些共同点，如使用英语、历史关联等，因此，在辞书编撰方面，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各自的学术组织，分别有中国华侨华人历史学会、华侨协会总会、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等机构。日本有神户、横滨、九州等华侨华人研究会地区性团体，全国性的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也已成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研究学者，相对分散，虽然如美国、新加坡等地也不乏侨史学术团体，但整合度较弱。在这一方面他们倒有点类似于其研究对象 diaspora，可姑且称之为华侨华人研究的 diaspora 学者群，跨国流动性强，国际性学术合作多。

日本华侨人数在世界上并不算多，但日本华侨华人学界阵营庞大。因为中国人旅日历史悠久，尤其是近代影响很大，同时日本企业特别重视与海外华商的竞争与合作，20 世纪 30 年代就出版了华侨调查丛书。所以日本华人学界研究者人数多，学术积累深厚。目前以游仲勋、安井三吉等为代表，同时还有斯波义信、滨下武志等加盟，成立了全国性的华侨学术研究协会。《事典》编撰人员达 195 名，由日本学人和旅日中国学者组成，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的华侨华人学者，可以说是日本华侨华人学界的成果大检阅。

新加坡、欧美、澳大利亚及我国港澳学者，包括华裔学者和非华裔学者，他们散居各地，虽然每一地都没有中国、日本那样研究人员为数众多，但与西方引领世界学术的大势相应，每一个体的研究都各有建树，而且形成了以王赓武为领袖，以各地中年学者为骨干的学术联系网络，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就是以此为主导的国际学术组织。

北美的华侨华人研究者，存在于美国亚裔研究群体之中。在这个移民国度中，华裔与日裔、韩裔、越南裔等为主体的亚裔，不仅在外貌上相似，而且在文化上也有许多共同点，相对于拉丁裔、黑人等，自成为一个族裔群体。许多大学开设的课程叫亚裔研究，一些大学还专门开设有亚裔系，学术组织称为亚裔研究学会，《美国亚裔百科全书》的编写也在筹备之中。美国的华侨华人研究者，以麦礼谦、沈己尧等老一辈历史学家与一批中青年华人社会学家居多。美国的学者研究视野基本上集中于美国本国的华人与亚裔，其他地区的学者则以本地为重点，但放眼全球，尤以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学者突出。这可能说明，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让人着迷，美国多元化社会本身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戏称，美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与学术高地而形成的唯我独尊的心态，使得许多学者未能顾及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研究。欧洲以非华裔学者引人注目，现任世界华人学会秘书长由哥本哈根的 Mette Thuno 担任，新的国际学术网络 Chi-

naWorld 也自 2006 年开始成立并活跃起来。

在世界华人研究学界，大陆学者群体阵营最为庞大，既有北京大学周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丘立本等资深学者，又有一批古道热肠的归侨与侨务工作者；既有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两个国家教育部相关重点研究基地，也有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华侨研究所、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近年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等。中国台湾学者长期重视有关我国海外华侨的学术研究，数十年来延续不断，学术积累深厚，历年出版的《华侨经济年鉴》引人注目。

2. 概念界定

关于华侨华人的称谓，论争纷纭，它折射出这一群体本身内涵的多元性与弹性。当学者围绕华侨、华人与华裔、散居华人（Chinese Diaspora）等概念进行区分并有所争论时，王赓武提出“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当学者论述战后华人从“叶落归根”转向“落地生根”时，刘宏提出“既不是叶落归根，也不是落地生根”，而是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这与国际移民的趋势是若合符节的。现代信息与交通技术快速发展，人口跨国流动日趋经常化，临时性移民（temporary migration）、往返性移民和巡回性移民（repeated and circulatory migration）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移民通过网络，生活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形成跨国社会（transnational community），并产生强烈的跨国主义意识（transnationism）。过去，国际人口迁移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他们或者成为永久居民，逐步汇入主流社会，或者作为暂时的劳工和侨民与母国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主权和权力都没有受到怀疑。但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随着跨国社会的普遍出现和跨国主义意识的增强，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多层公民权（multi-layered citizenship）、双重国籍（dual national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国家主权问题受到挑战。

表 0-1 华侨华人相关概念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内涵与外延的侧重
Overseas Chinese	海外华人，华侨	中国视野的概念，强调与中国的关系
Ethnic Chinese	华裔，华族	强调与住在国的关系，保持其血缘性。美国习惯用“华裔”，东南亚习惯用“华族”
Chinese American	美国华人，华裔美国人	
Chinese Tai	泰国华族，华裔泰国人	
Chinese Diaspora	散居华人，游散族群	侧重其游移性、分散性或国际性
Transnational Chinese	跨国华人	强调其跨国性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就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与感知。韩方明提出华人三重性：中华性、本土性、国际性。这种三重性，各国具有不同的形态。而刘宏在分析新加坡战后新加坡华人的变化时，则以“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来加以概括。

名称各异与论述纷争将研究推向深入，予人启发。本书使用的概念，承认这种多重性与弹性，及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华侨”是确定的，即拥有中国国籍的国外侨居者。“华人”、“华裔”则不作明确的区分，当包括混血后代时，则使用“华裔”。

民族具有政治性与血缘性，纯粹血缘性的民族与政治性的民族有交叉，却不一致。就华商而论，从血缘上他们具有华人的血脉，在政治上他们又是从属于当地国家层面的民族。他们认同于居住地国家与政府，但参政意识程度不一。他们是居住国的少数民族，不是主体民族。在许多国家还受到或曾经受到主体民族的某种程度的排挤甚至打压。即使是在法律上各族平等的国家，其声音与诉求也是微弱的，或无足轻重的。加之其本身具有游移性、流动性与国际性，这种特征又得到强化。在文化上，他们既具有与生俱来及源自于家庭、亲友的中华文化要素，又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浸透了当地文化的因素，同时也感染了全球强势的西方文化。

作者简介

龙登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云南大学李埏教授，并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海外华商、中国市场史、制度变迁等研究，在国内外出版专著 6 部，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留学基金、华夏英才基金、哈佛燕京项目（Harvard-Yenching）等课题。入选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人才百人工程。曾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目 录

序 前言

上篇 穿越历史与地域：华人分布与经济变迁

第一章 世界华侨华人地理分布与历史变迁·····	3
一、世界华侨华人的地理分布与国际移民大势·····	3
二、海外华商源流：本土化与多元化的演进·····	7
第二章 东南亚华商：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变化·····	15
一、华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	16
二、殖民地经济体系中海外华商的中介角色·····	19
三、经济全球化中的海外华商：与跨国公司的互补性竞争关系·····	22
第三章 美国华商——在边缘与前沿的经济成长·····	28
一、移民构造的美国华人社会经济：两级生态与消费结构·····	28
二、美国华商企业：多元族群视野的考察·····	37
三、前沿经济形态的成长：以硅谷为代表的新经济·····	42
四、边缘经济形态及其变化趋势·····	47

中篇 跨越族群、国家与制度

第四章 在族群与主流经济之间——唐人街经济及其超越·····	57
一、产业集聚与族群经济·····	57
二、纽约唐人街：移民塑造族群经济·····	62
三、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纽约唐人街·····	67
四、超越族群圈：唐人街大巴走向主流·····	73
第五章 信用机制与跨国网络运作·····	79
一、在海外重建认同与网络——从华人基督教会网络谈起·····	79
二、交易规则：在网络之内与国际之间·····	83
三、信用机制：人格化与社会化·····	88
四、网络金融资本与华商创业·····	91

第六章 跨国金融网络实证：偷渡客与蛇头	96
一、中国偷渡客及其费用	96
二、人格化交易金融网络：融资方式与渠道	104
三、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回报	109
四、蛇头网络：市场网络联结而非等级组织运作	113
五、出国劳务与移民：理性选择与大势所趋	118
第七章 海外华商在中国与世界之间	125
一、海外华商与侨乡经济	125
二、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海外华商与中国企业互动互利	131
下篇 跨越文化与制度：海外华商的经营与管理	
第八章 华商创业与家族经营	141
一、华人是否偏好当老板	141
二、移民创业与美国华人小企业	144
三、华商家族企业形态与组织特征	150
四、华商家族企业的治理与改造	155
第九章 跨文化适应与管理策略：海外华商在大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	162
一、海外华商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	162
二、员工内部化服务与团队管理：成本选择与文化适应	164
三、华商企业保密薪酬制实证分析：管理逻辑与文化适应	170
第十章 全球化产业链中的战略选择	178
一、全球化下的海外华商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实践	178
二、全球化产业链中的战略选择：案例分析（上）	182
三、品牌战略的困境与核心竞争力铸造：案例分析（下）	186
结论	193
一、主要观点	193
二、选择论：我的解释框架	195
参考文献	199
后记	211

上 篇

穿越历史与地域：华人分布与经济变迁